

中图分类号: J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9)04-0126-(07)

文艺繁荣与城市文化之关系

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艺术的黄金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背景与支撑,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艺术活动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是因为城市的功能内在地包含着对艺术活动的需要,为艺术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而城市的文化特性为艺术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对艺术的需要和投入,城市庇护着艺术活动,艺术的象征性、表现性与膜拜价值使得它成为了城市政治与宗教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城市人的生活只有在艺术活动中才得以维系下去并不断发展,艺术活动是城市这种特殊的生活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城市的繁荣是文艺繁荣的基础,文艺繁荣是城市繁荣与发展的推动力。

关键词: 城市文化;文艺繁荣;美学研究

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艺的黄金时代,如希腊人的伯利克利时代、罗马人的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人的美第奇家族时代、英国人的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法国人的路易十四时代、德国人的腓特烈大帝时代、中国人的开元天宝时代……在这些文艺繁荣的时代背后,有没有某种必然作为支撑?考虑到文艺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试图去寻找这种必然有一点像挑战风车,但不去尝试,怎么知道没有结果?

这种必然可能是一个经济问题(弗里契的庸俗艺术社会学把文艺繁荣直接归之于经济)、一个政治问题(比如把艺术的繁荣直接归之于政治上的开明,或者所谓的“自由”),也可能是一个民

族发展史的问题(几乎所有呼喊“文艺复兴”的人都将之视为民族崛起的象征)。而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文艺的繁荣是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决定的?在这个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时代,这种提问并不过分。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答案是——城市。

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但我们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个假设:文明史上每一次文艺的繁荣都发生在城市之中。以上被我们所列举的艺术的繁荣时代,都有一个城市作为背景与舞台。雅典、罗马、佛罗伦萨、伦敦、巴黎、长安……这种假设是有道理的吗?如果我们能够探明城市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会对解开文艺繁荣之

收稿日期: 2009-05-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与欧洲近代审美精神的起源》
(08JC751031)

作者简介: 刘旭光(1974-),男,甘肃武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谜有所裨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抽象的自由、简单化的经济发达,或者不满足于把文艺的繁荣仅仅归之为精神问题,那么何不去探寻一条可能的柳暗花明之路。

可这个假设至少要面对这样的质诘:文艺永远有其文化基础,民间的或者乡土的文化生活是文艺之根,而这些根决不会仅仅生长在城市中。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这里所要研究的不是文化与文艺上的常态,不是探索文艺之根,如果文艺的延续是一条源远流长之河,我们所问的不是河流的源头在哪里,而只是问那最美的浪花,或者那些美丽的河段是如何产生的。

那么一个个地来回答问题:为什么是城市?城市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与人的艺术活动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城市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推动着文艺的繁荣?

一、城市对艺术活动的需要

城市文化与艺术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人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考古学家柴尔德也把艺术视为城市诞生的一个标志,似乎艺术是城市的一部分,是城市的规定性。问题在于,为什么艺术对城市是一种具有规定性的东西?另外,历史经验也表明,所有的伟大艺术主要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城市是艺术活动的主要舞台。繁荣是因为需要,在城市中是什么样的需要使得艺术成为城市文化的必然?

我们相信,城市的功能内在地包含着对于艺术活动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从城市的功能出发,提炼出城市对艺术活动的需要。

相对于农业型的乡村而言,城市的生活是独特的。城市生活首先是社会交流的结果,反过来也是社会交流的原因。城市的源头之一是早期的市集,人们交换剩余产品,当这种功能强化并且规模扩大到成为区域交换中心,这就吸引了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人们,为了交换的方便而聚集在这些集市周围,城市于是诞生了。而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人类的交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交流扩大到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而且是信息的交流,是

人的思想、情感的交流,是文化上的交流。从现代城市的经验来看,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体育、艺术诸多领域内拥有制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权利,这种权利意味着它具有两个根本性的功能,一是实体符号化;二是媒介转换。实体符号化意味着,城市在商品交易与非生产性的社会活动中,它和集市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以实物形态进行物品交换,而是把这一交换符号化,转换为信息,以信息交换的方式取代实物交换。这种符号化的发生是要借助媒介的,所以,媒介的性质能够决定文化的性质,而且,它还要完成信息在各种媒介间的互译。传播的过程,就是互译的过程,来自社会各个部分的信息汇集到城市之中,在城市中被再次符号化,并以新的媒介传播出去。

信息的传递与记录需要媒介,而这种媒介最初只能是图像、造型,并最终促成文字和记数制度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图像、造型和文字化的书面写作成为必需,它们是人类进行信息传递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工具,尽管人类进行造型与图像化的手段与媒介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字系统也愈加严密与复杂,但它们传递信息的功能却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比乡村有更大的造型、造像与文字的制度的需要。这种需要使得艺术活动对于城市生活而言成为绝对需要,尽管这种活动并不直接等同于艺术活动,但艺术活动就包含于其中。

其次,从城市人口的构成和功能方面来看,城市人民也与任何村庄的人民不同。从城市的最初形态来看,虽然大多数城市居民很可能仍然是农民,并以耕耘城市周围的田地为业。但是所有的城市都一定包容着其他的阶层——他们自己不靠农耕、饲养或者渔猎而谋生,他们是专职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师、军人。他们当然全都依靠乡村中的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而生活,但脱离农业生产的城市生活使得他们更趋向于专业化,并完全依靠其手艺生活着。社会劳动的专门化,标志着农村必须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以养活这些不事农业生产的人,也标志着专门化的技艺活动的展开。

城市庇护着这种活动,在城市中,各种技艺会

得到稳定的传承和发展并形成专门的群体,同时进行更进一步的细分。而技艺的成熟与发达对于艺术意味着什么?艺术这个词在其本源处,就是技艺,现在的艺术体系只不过是技艺分化的结果。这能够说明,为什么艺术的深入发展总是在城市中进行并实现的。

这种技艺的分化使得城市有了专职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按柴尔德的说法:“由集中的社会剩余财富供养的其他专职人员,转向新的艺术表达方面。蒙昧人甚至在旧石器时代就尝试过艺术,有时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他们描绘他们看到的动物甚至人,手法具体又自然。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从不做这类事情;他们从不试图描写自然物,但是他们喜爱用抽象的几何图形来用作自然物的象征,这种几何图形最多可能通过一些特征表示古怪的人或者动、植物。但是,埃及、苏美尔、印度和玛雅的艺术——工匠——专职的雕塑家、画家或者印章雕刻家,再一次开始雕刻、塑造和描绘人或物,但已不再是猎人们古拙的自然主义手法,而是根据概念化和复杂化的风格进行创作。”

这仅仅说明城市进行艺术活动有制度上的可能,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概念化与复杂的风格化的创造?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二、城市的文化特性与艺术活动

城市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区域中心的性质。这里说的中心最初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权力的中心,特别是作为行政首都的大城市;其次是宗教中心;第三是作为军事重镇。城市在其起源处除了市集,就是作为宗教中心与军事堡垒。

首先看城市的政治活动对于艺术的需要。城市作为区域政治权力的中心,体现出对周边农村地区的威慑,这种威慑的基础是军事、监狱等暴力机构,而表现为税收、征役等权力。权力及其威慑是一种无形的抽象形式,必须让这种无形的东西有形化,结果政治的因素要求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展示自身的威慑力。庄严、崇高、辉煌、巨大、神圣性这些统治者认为属于自己的观念,实际上与统治者的威慑力或者说想得到的威慑力是一体的,

它们必须以视觉形式展示出来,结果这些观念就在建筑,特别是巨大的宫殿与重要的政治权力场所,如法庭、议会、议事厅等表现出来。礼仪甚至是礼俗式的容器,都成为这种威慑力的象征手段与表现形式。这些事物有其实际功能,但其形式已经呈现出精神性的因素,成为观念的感性形式,所以在后世的文化体系中它们是被作为艺术看待的。

城市中的政治活动由一系列的活动构成,行政会议、民众集会、权力展示、文化典仪、纪念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一方面需要场所,一方面需要形式。权力希望获得物质性的形式与精神性的内涵,这构成了城市对于艺术的需要。因为只有艺术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而这种需要是系统化的需要。对于一个官方建筑来说,完成它并不仅仅是建筑师的任務,当然,建筑师必须把符合统治者政权追求的观念因素体现到他对于建筑的整体设计中,只要有政治权力中心存在,建筑艺术就永远会在民居之外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建筑艺术是官方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但建筑师仅仅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建筑只是政治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在这座政治性的建筑内还需要绘画,需要雕塑。

绘画的视觉性质与展示性质使得自身在政治典仪中具有重要作用。在19世纪照相术发明之前,除了绘画,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进行图像化的展示,而这种展示对于政治活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既是再现性的纪念,也是表现性的炫耀,由于这种功能,使得绘画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言说方式。雕塑在政治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其膜拜价值和纪念性,在世的政治人物的肖像性雕塑意图在于表现政治权威,而不在世人物的雕塑则在于表现某种政治理念和对先贤的膜拜,或者是权力链通过造像活动表达其传承。

雕塑、绘画与建筑是一体的,它们装饰着建筑的内在空间,也比建筑更加直观地表现某种理念性的东西,因此一个作为整体的建筑,既是政治活动的空间,也是政治信念的展示方式。

宫廷和政治活动还需要音乐与舞蹈,这是典仪活动必需的部分,当然还需要诗,特别是颂诗与具有政治纪念性与政治展示性的诗。诗乐舞共同构成了群体性政治的表现形式,构成政治活动的

典仪性,而人们也需要为这种典仪性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因此许多种艺术门类起源于宫廷特别是宫廷典仪就不难理解了。

城市与政治活动的紧密联系是乡村无法比拟的,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对艺术活动的需要远远高于乡村,纪念、展示、象征,政治权力的感性化是政治的一部分,因此艺术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只要城市作为政治舞台的功能不变,艺术就永远是城市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

其次我们需要研究城市生活对于宗教的需要和这种需要与城市中艺术活动的关系。按芒福德的研究,城市最初起源于宗教性的人类聚集点,在这个聚集点上人类才有了交换活动,并且把这一活动固定下来。这种关于城市起源的理论强调了宗教对于城市的意义,它似乎说明了宗教性是城市的本性之一。

历史上人类有许多宗教化的大城市,现代之前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都市也同时是宗教活动的核心地区。城市是人类交易的地方、统治的地方、也是朝圣的地方、祈祷的地方。宗教对于艺术的需要构成了艺术活动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因之一,因为艺术是内在于宗教的。

城市对于宗教的需要和宗教对于艺术的需要是内在联系的问题,城市作为人类聚集点,宗教构成了它聚集的内动力,驱使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除了交换的需要和求完全的需要,就是宗教需要。宗教给予人们共同的价值尺度与理想,给予人们相互团结的信念,宗教对于人口过于密集的城市来说,有效地调节着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到现代之前,城市生活离不开宗教。为了传播的需要,宗教必须给无形的神赋予感性的形体,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来说,偶像崇拜是有必要的。基督教曾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但是偶像崇拜派对于反偶像崇拜派的压倒性胜利使得基督教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依赖关系,没有艺术,我们不能想像基督教的传播。因此在中世纪晚期的造型艺术和平面艺术方面,宗教对艺术的需要为它们的繁荣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包括资金、场所、艺术家的训练,特别是艺术作品的题材。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佛教中,即使像伊斯兰教这样反偶像崇拜的宗教,也以一种更间接的方式

表现出艺术所具有的象征性。

宗教对于艺术的需要一方面是因为偶像崇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宗教传播的需要。只有把抽象的宗教世界观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图形图像,才能把更为广大的民众吸引到宗教中来,才能激活宗教情感。因此以艺术化的方式宣扬宗教观念,是宗教维系自身存在的必要手段,宗教故事、宗教人物、宗教事件、宗教生活,这些题材和对这些题材的需要,成了造型艺术的主要内容和推动力,各种形式的壁画、绘画、雕塑在这里找到了发展的舞台。

宗教对于艺术的需要还体现在,为了保持其神秘性,宗教必须保持高度仪式化,仪式的场所和仪式的过程都产生了造像的需要,而且在这种仪式化的过程之中,营造相应氛围的需要使得音乐、诗歌都成为需要。宗教仪式本质上的表演性质使得仪式本身包含着戏剧性,所有的表演艺术都可以在宗教仪式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还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朝拜的膜拜性质使得宗教艺术必须强化这种膜拜的虔诚性。更直接地说,宗教需要借助艺术从而对膜拜者产生震慑力。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佛教徒创造了巨型造像,并且以石窟式的大型群像强化这种效果;而基督教则走向巨大的教堂和教堂的繁复装饰,这都强化着宗教活动对于艺术的需要。尽管基督教在中世纪时从理论上讲是反对艺术的,但它却是实际上的艺术生产者与艺术订货者。宗教是艺术忠实的庇护人。

三、城市生活对艺术活动内在需求

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差异在于,城市是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相对封闭的空间,城市的堡垒性质是它区别于农村的最重要的标志,乡村的相对开放性和居民在生产中的相对独立性使得城市生活显得更需要人群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交流。就规模来讲,第一批城市一定比任何以前的聚落都更大,容纳的人都更多,尽管它们可能大大小于现代的许多村庄,而作为城市化的成果,城市的规模大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当数量巨大的人群拥挤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中时,当每个人的生

存空间被缩小到尽可能小时,怎么能调解每一个独立个性之间产生的强烈的排斥力?在城市内充斥着过剩的“利必多”,城市人口中的流动人口的诸种需要、城市各阶层的对抗与矛盾,这使得城市像一个沸腾的大锅,里面翻滚着各种欲望、冲突和需要。

就城市居民的构成来说,最初的城市大多数居民很可能仍然是农民,并以耕耘城市周围的田地为业。但是所有的城市都一定包容着其他的阶层——他们自己不靠农耕、饲养或者渔猎而谋生,他们是专职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师。进入工业化时期以来,城市成为非农业人口的聚居地,社会分工对于城市人口构成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城市人口成为社会生产与社会流通各环节内的人员的综合体。城市生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生活,每一个人都只是社会生产链上的一个环节,离开其他环节个体的人无法生存。但城市人却又是更具自主性的个体的人,这源自社会生产与社会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何将这既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人凝聚起来,这是城市文化的最核心的课题。交流与调解是城市文化必须承担的使命。

交流不仅仅是商品交流,同样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与情感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物物的直接交流,它需要一个公共媒介,这个媒介的使命是让个体可以通过它而获得共鸣。而艺术与艺术家恰恰是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艺术作为个体而存在,却是为群体而创作的。

在城市文化中公众的交流最初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展开的,集体性的节庆、集体性的礼仪活动、集体狂欢,这都是进行交流的有效手段。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中这种集体活动是贯穿始终的,直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大到这种活动的组织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与交通问题超出了城市当局所能应付的范围时,这种活动才衰落了。但在现代之前,这种活动一直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源自最初的庙会,并最终在大城市的生活中成为群体集会的重要形式与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种集体活动中,音乐和舞台以及戏剧表演成为最被用到的工具,当然还有节庆道具的制作、服饰、木制或者纸制偶像、彩车装饰,还需要有

人表演,需要有人歌唱,也需要有人为歌唱填词。诗、乐、舞在这些节庆与礼仪中找到了用武之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集体活动对于城市生活的意义的话,也就承认了艺术对于城市生活的意义。

但这种交流却不是城市人交流的主要形式,因为这种集体性的活动是有规律性与周期性的,而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却不具有这种周期性。因此,民众生活中情感交流需要更日常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最便捷与有效的手段就是艺术。抒情诗在城市生活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在古希腊的雅典时代,吟唱抒情诗就已成为城市生活中进行情感交流的主要手段,抒情诗人承担起了情感交流和娱乐的双重作用。而音乐,特别是抒情性质的歌曲和民谣,它们脱胎于民歌,也在城市找到了发展空间并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变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大行其道的流行歌曲就是源自城市生活中情感交流的需要。

必须注意的是,情感的交流是以具体的方式展开的,城市的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情感需要,也有不同的交流情感的方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民谣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对于商人阶层和城市贵族来说,他们会以室内乐的方式寻求满足。城市生活拉开了各种艺术的内在层次区分,使得艺术的种类更加丰富,内在的交流更加频繁,也更具有表现力。从“利必多”升华的角度来说,城市也比乡村有更多的对于艺术的需要。

城市文化和信息传播媒介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城市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是被他们所利用的媒介所制约或者推动的,因而还应当考虑书籍在城市文化中的意义。印刷术所带来的信息的传送使得城市交流更加迅速更加深入,书信体的文学、报纸这一城市的产物,还有小说的出现,特别是最初具有报道性质的短篇小说,城市生活对于书籍、报纸、书信的需要,使得文学在城市生活中比乡村中更有基础,毕竟,城市意味着更高的识字率、更多的会写字的人。

城市的内在交流最终促成了城市各种机构的设置,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促成了大学的出现,同情心与爱心以及思想交流的需要最后凝结为养老院、孤儿院、图书馆……这意味着,城市有更多的

对公共建筑的需要,从而为建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展示机会,也使得城市规划的诞生,城市本身被作为一件艺术品来营造。但营造一座城市并非完全按交通与生活的需要展开,城市的规划者和城市布局的改进者往往担负着展示城市集体人格的任务,城市标志性建筑、标志性雕塑或者标志性街区、标志性大道,这些东西向外来人展示着城市人的精神气质,展示着他们的集体性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风头主义或者表现财富与权力象征性的东西。

其次,城市是社会剩余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源自于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以至于可以让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和相关物质生产,在这个生产水平上城市生活才真正开始,而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城市生活总体上比乡村生活更加富足,也更加安定。在城市中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减少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也减小了,城市因此获得了比乡村更多的闲暇。城市的富足从两方面保证艺术活动在城市中的展开。首先是社会剩余使得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社会物质生产与流通而专职进行艺术活动,这种专职性的活动又不断再分工与细化,这是精致艺术品产生的人员保证。而城市中较为集中的财富使得大规模的艺术创造活动得以进行,更重要的是,艺术最终是属于人民的,民众的参与是艺术得以繁荣的前提。问题是,民众介入到艺术活动中的动因是什么呢?

人们对艺术的需要归根到底是娱乐的需要,城市某些阶层的闲暇与所有阶层对于娱乐的需要是城市进行艺术生产的前提。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娱乐与休闲,而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就是由这个时代的人的主导的娱乐方式决定的。人们所能投入到娱乐之中的时间和金钱决定着艺术生产的规模,这也是艺术繁荣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没有数量上的保证,对质量的追求就没有必要。

因此,一个时代的人的娱乐方式对艺术的繁荣来说是前提性的。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繁荣与17世纪在法国的繁荣和中国清初在扬州的繁荣,完全是因为娱乐的需要。当激烈的竞争促使艺术家进行精益求精的尝试与探究时,它就完全摆脱了街头杂耍的性质而成为一门艺术。戏

剧的根基在于乡村,在于乡村最初的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但只有在城市中,它才上升为艺术。小说的产生起于相同的动因,市民的娱乐要求使得编故事成为一门职业,结果听故事和阅读故事成为城市人一种不可缺少的娱乐手段。当然娱乐的层次有高低,结果戏剧和小说也体现出这种层次区分。在我们的时代,电影和电视成为人们娱乐的最主要的方式,这注定了这两门艺术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艺术并获得最大的投入和最多的产出,而文学也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得到传播。

从欧洲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生活的娱乐需要促成了宗教音乐向世俗音乐的转变,也促成了讽刺诗、打油诗、传奇、喜剧、马戏等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城市的娱乐需要对于文艺的生产来说,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

第三,城市生活与艺术活动的联系还体现在城市美化自身的需要和城市生活审美化的需要。城市的生活本身是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展开的,必须以秩序化的方式整理空间、规划空间,才能使城市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19世纪的城市运动以前,大城市在文学中的主要意象是一个拥挤、嘈杂、充满犯罪的“恶之花”,但城市人一直致力于美化城市环境。城市最初的“恶”源自城墙的封闭性造成城市空间拥挤和人口密度过大,工业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分布又被生产布局和阶级分立所决定,但美化城市空间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课题,拓宽马路,规划街区,设置公园与绿地,摆放城市雕塑,解决厕所与城市给排水问题,追求城市建筑在风格上的统一性,扩大城市绿化,保护城市文化遗迹,老城区区保护……城市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园林、建筑、雕塑这些艺术门类在城市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当然城市人不仅仅是美化城市的公共空间,对于私人的生活空间,也体现出了比乡村更多的美化愿望。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小局促的生活空间所带来的压抑感,另一方面也是城市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炫耀自身品味与地位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已经文明到要求以美的方式生活的地步。因此城市人不仅仅美化公共空间,也美化私人生活空间,更懂得美化自身。

城市人对于家居环境的美化促成了装饰性艺

术的繁荣。从最初的风景画,到后来的风俗化,都体现出了艺术对于这一要求的服从,特别是绘画在进入印象派与抽象派之后,这些画主要是用于家庭装饰的目的,而之前的古典绘画更多的是宫廷与公共建筑的装饰。美化家庭生活这种要求在 19 世纪的工艺美术运动以及包豪斯运动中成为艺术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在这个倾向下,城市生活更加精致,更具有审美特性,城市人也更加愿意修饰自己。

艺术在这个层面上更加倾向于装饰性,但另一个方面是艺术与生活关系更加紧密了,生活艺术化与艺术生活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基调之一,这既显现着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也体现着当下与未来艺术发展的方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以往历史的事实,也是未来文明发展的趋势。而艺术活动为这种“更美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城市需要艺术,正如艺术需要城市。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更美好的城市生活,那么就让艺术活动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每个环

节;如果我们希望在未来看到艺术的繁荣,那么让城市为艺术活动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与物质基础。

注释:

引自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2 页。

参考文献:

- [1] 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M]. 宋俊岭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2] 柴尔德. 城市革命 [A]. 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C].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 [3] 韦伯. 韦伯作品集 (VI)——非正常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M]. 康乐,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 Simmel, 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A]. Kasnitz, Philip, ed. *Metropolis: Center and Symbol of Our Times*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Mumford, Lewis. *The culture of cities* [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San Diego New York, 197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urishment of Literature & Art and Urban Culture

LIU Xu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ery golden a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d a city as its background and its support. A city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possesses inherent relations to art activities and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its art prosperity. The city plays this role, first and foremost because its functions inherently include its demands for art activities an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m, and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city promote the flourishing of art activities by supplying them with needs for and investments in arts. A city shelters and protects its art activities, while the symbolic and expressive character as well as worship value of art enable it to become an inevitable part of urban politics and religious life. Meanwhile, urban residents' life can be maintained and developed only through art activities. Obviously, art activiti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a city as a particular form of life. Urban prosperity forms the basis of the f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pushing forward urba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 culture, f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on aesthetics

(责任编辑:陈 吉)